



国防大学 2 071 3154 8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24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

问题的一段接触 湛小岑(1)

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

的一段经历 康 泽(16)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濮清泉(24)

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 濮清泉(69)

“工合”运动记述 路易·艾黎(89)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卢广绵(94)

早期之中国旅行社 潘泰封(117)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

.....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整理(143)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171)

补充·订正·质疑

《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文内有错误

..... 刘 岩 潮 (178)

对《蒋介石背叛革命下台又上台》一文的订正

..... 宋 瑞 珂 (179)

对《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几篇稿件的订正和

补充..... 宋 瑞 珂 (180)

对《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一文的订正

..... 李 骏 (186)

关于汉奸周佛海所任伪职的补充和订正..... 蔡 德 金 (187)

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 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

谌小岑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这一段期间，国民党曾由英美派曾养甫出面，同共产党有过一度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接触，具体联系工作是由我担任的。我曾分别通过左恭同中共长江局取得联系，通过吕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翦伯赞在初期也曾参加过这项活动。兹就记忆所及，就当时形势和接触经过纪其大要于下。

一、中共《八一宣言》在国民党内发生的影响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步步加紧入侵，全国人民纷起要求团结抗日，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一方面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方面坚持反共内战，继续进攻红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曾屡次发表宣言，号召对日作战，反对蒋政府对日寇的卖国停战协定；并采取行动，实行同国民党军人李济深、冯玉祥等联合抗日，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人们，与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及其他抗日军队一起，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集中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

致对外”的迫切要求。它不但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在国民党内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般说来,国民党内受过孙中山先生教诲的党员大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决心也并不怀疑。《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国民党内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中国古训,希望国共两党合力御侮。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也不得不引起联共抗日的想法。只有那些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们认为“共产党自然希望打起来,它是惟恐天下不乱的”。

一九三五年年底开始的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接触,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亦即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关于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发动进行的。

二、曾养甫给我的任务和我们的一些基本看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工作,担任理事会秘书的职务。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是由曾养甫以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的身份兼任的。我和他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在天津北京大学的同学。一九三四年,他见我在南京失业,邀我去杭州,接谈之下,颇为相投。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派的重要角色,事实上他同宋子文也是很接近的。他曾在美国留学,属于英美派。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他到云南去了一些时候,查勘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路线(据说当时英国已经同意修筑这条路线)。十月下旬,我因事由杭州去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在李公朴家中读到了《八一宣言》,印象很深刻。我还和李公朴交换了意见。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很好。当我到了南京时,正值曾养甫也刚从云南回到南京。我到他的家里同他见了面。我在谈话中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疯狂性质,最后提到了冯玉祥等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征询他的意见如何。他说:

“我很赞成。”话没有谈完，因来客中止。我当天回到杭州。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一个电报，要我去南京。我到南京同他见面时，他正要出门，简略地以“打通共产党关系”相嘱。他知道我在“五四”运动中加入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同周恩来有过一些关系，也知道我常同一些左派朋友来往。

“打通共产党关系”，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在他家里独自呆了半个钟头，考虑这个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桩极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情，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同时我又是可以想办法进行这个工作的，因此决心把它接受下来。

在进行工作的期间，我几乎天天到曾养甫家去，对有关对日抗战诸多方面的问题都有所谈论。有些问题我们是有过争论的，但有些论断基本上还是取得了·一致。

我们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一经发动，就会是长期而艰苦的。我们应当利用广大的空间去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抗战的主要条件是人口众多，兵源丰富，农民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将会起重大作用。我们认为，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官僚作风是和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的要求背道面驰的；而共产党红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作战的战略，对抗日作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向他提出了“欢迎红军收复失地”的口号，他表示接受。

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同意一方面要争取英美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要争取苏联的援助，而且认为联俄与联共是分不开的。

最初，左派朋友对蒋介石是否有对日抗战的决心和诚意是怀疑的。我从李公朴那里得到救国会派在这个问题上所提的一连串的意见：为什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采取妥协的态度？为什么要取缔学生、工人、各文化团体和爱国人士的抗日救国运动？这同“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的行为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不开放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什么还要对红军继续作战？蒋介石是否在奉行清末的那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亡国政策？为

什么要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曾向曾养甫反映了这些意见。

曾养甫对蒋介石是“忠诚无间”的。他总是想着要说服我，使我相信蒋介石终于要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而且惟有蒋介石才能担当得起领导抗日的责任。他同意我对汪精卫的看法，也认为这个人是妨碍联共抗日的一个危险分子。可是他说，“攘外必先安内”口号的提出，是为了要先求国内“统一”；同中共的关系必须先谈好了才能停战。他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和宣传上攻击南京政府是国共合作的障碍。但他始终认为同共产党进行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接触是件极关重要的事情。

他还解释说，蒋介石对日本之所以暂时取妥协的态度，是为了争取时间来完成一些必要的准备。他告诉我，是年九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时，冯玉祥曾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何应钦答复说：“许多地方，特别是山东这样离日本很近的沿海省区，都还没有防空网。”当时还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叫来过问。

我们曾辩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抗日政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南京政府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情况下，是没法求得统一的；惟有采取鲜明的抗日主张和坚决的抗战态度，才能求得统一。曾养甫说我只看到事情的一面。他认为有许多地方军阀是宁肯当汉奸而不愿服从中央的命令；在不能统一调动全国人力物力的情况下，立刻发动战争是很危险的。

我们也曾谈到国共合作成功后共产党的政治地位问题，但没有得出结论。曾养甫认为，这个问题还要好好研究，但是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肯定的。

这年十二月汪精卫被刺后，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在发表之前，我们都估计行政院长可能是宋子文），南京的抗战气氛渐见浓厚起来。冯玉祥发表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也是国民党加紧备战的标志之一。曾养甫任铁道部政务次长，他调我到南京任

铁道部劳工科长，我同他的接触更加方便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南京《中央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文告——《告国人书》。一则曰：“万恶之共党即利用此救国之呼声以作其祸国烟幕。”“现在横亘于民族前途之大患有二，一为白色帝国主义，一为赤色帝国主义”。再则曰：“如甘心为共党所利用，……政府自不得不……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云云。我去质问曾养甫。他哭丧着脸说，他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再三叮嘱我暂时停止活动。

这篇《告国人书》，在表面上是说中共正在策动各地文化团体进行救国运动，因此要加以防范，骨子里是否另有文章，我曾同几个朋友加以研究。那时日本正在更换驻华大使，有吉被召回国，有田还没有来。蒋介石对广田三原则所要求的承认“满洲国”这一条，是一剂吞不下去的苦药，但对于“共同防共”，则认为最合心意。由此判断，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这样一个文告，其目的是在向日本讨价还价，也是可能的，因为继这个文告之后，并没有什么行动。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文告的发表在国民党内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我从杭州调到南京铁道部任职不久，就在曾养甫支持下，接办了《扶轮日报》。左恭、千家驹负责在该报编了一个取名《民族阵线》的副刊，公开讨论对日抗战的问题，主张开放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关于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不一月，这份报销售达八千份以上，而且也没有出什么乱子。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特务们知道这个报有曾养甫的背景；一方面也是因为到了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南京政府对抗日言论已在一定范围内稍稍开放的缘故。

在进行联系工作的过程中，曾养甫曾一再向我表示，他要争取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参加，通过他们同蒋联系，较为方便。同时，他也常提到宋子文的抗日决心和办法。他说，争取英美援助的工作都是由宋子文担任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某日，我在陈立夫口授下，笔录了关于国

共联合抗日的四项办法(详见本文第六节)。从此以后,我的思想就偏向于相信蒋介石是真正在准备抗日而不疑了。

三、具体的联系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当曾养甫对我说了要“打通共产党关系”那句简单的嘱咐之后,我当晚就去找人商量,找到的第一个人是翦伯赞^①。第二天我又告诉了左恭^②。翦、左两人都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而且也是有办法好想的。我曾向曾养甫提及,打算到上海找李公朴。他怕救国会分子复杂,容易泄漏秘密,主张先就我自己认为可靠的关系进行联系,但他同意采取多线联系的办法。

当时翦伯赞向我建议,要我向曾说,最好的办法是先把关在监狱的共产党员释放一两个出来,一方面可以表示国民党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他并且具体地提出,最好先释放他的桃源同乡同学董维键。曾养甫同意了这个办法。他用电话通知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之后,翦和我在徐恩曾所派的一个特务陪同下到卫戍司令部的监狱里见了董维键。董表示只要中统同意,他愿意到湘西找贺龙将军,说贺将军那里有电台可同中共中央联系。董还提到陈立夫正想请他把陈自己写的《唯生论》译成英文。后来中统不同意将董维键释放,这个办法行不通了。我就在十一月下旬同翦伯赞商量后,写信到北平邀吕振羽南来。两个月后的一个大雪天,翦又去监狱里看了一次董维键。天那么冷,董连袜子都没得穿。董告诉翦说,他借口眼睛不好,没有给陈立夫译《唯生论》,也许这就是中统不肯释放他的原因。

① 我曾于一九三二年在天津办过《丰台》旬刊,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不抵抗主义,翦伯赞曾在《丰台》旬刊上写过文章,他还邀请吕振羽及其他左派同志向《丰台》旬刊投稿。他们曾把许多进步书报介绍给我阅读。

② 我和左恭曾同在一九三三年于南京出版《生力》杂志,主张团结国内一切力量,一致对外。

我给吕振羽的信大意是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不几天工夫，吕即到了南京。翦、左都说上海有关系可找到。十二月初，我们先后到了上海。

最初，翦伯赞介绍了他的一位同乡，董维键的亲戚张祺。张祺当时是一个中共上海市的工作同志。我们谈了两次话，不得要领，大概是因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后来我们找到了中共长江局的关系，就没有再去找他谈，他也没有回信。

四、中央黄同志的往返奔波

左恭通过中共长江局的组织关系，介绍了一位黄同志同我见面（左说，至今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我们谈过几次话之后，他表示愿意尽力为国共联合抗日而奔走。最初，黄曾提出希望国民党方面能派一个人同去延安。我们选定的一个人是在一九三二年因立三路线被捕而投降中统的人，黄因为此人是中共的叛徒，表示反对，故而作罢。最后，他告诉我中共组织上决定派他去一次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请示。之后，他就走了。

我同黄谈话时，最初是以国民党代表的姿态出现的。我尽可能地将南京政府准备抗日的许多有关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措施向他陈述，并表示了对日抗战最后必然胜利的信心。我还对他说，发动抗日战争的关键就在于国共能够合作；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因此就要动员全国农工群众进行全民性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最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我还强调了国共当时所进行的战争徒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

同时，我在同黄的谈话中，曾以中小地主阶级代表的口气对他说明土地改革是中山先生的主张，国民党员中的中山先生忠实信徒一定是愿意奉行的，但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以后再进行，这

样就可以团结一部分地主，使他们也能参加抗战。

一九三六年四月底，黄到过一次南京，曾养甫在家里接见了。他表示希望了解南京方面对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五月中，陈立夫口授了四项办法之后，我抄了一份交他携走了。同时，我请覃振写了一封信给林老（伯渠）。我同林老的关系曾养甫是不知道的，这封信的交付也没有报告曾养甫。

七月初，黄回到南京。这一次他显然是从延安来的，因为他带来了周恩来亲笔写的几封信。我只记得有一封是给张伯苓，一封是给时子周的。每封都写了十几页信纸，信的内容大意是：把“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中共历次发表的关于一贯主张对日抗战的几个文件内容加以重述，表示中共愿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亲日派、顽固派从中作梗，不愿同工农红军停战议和，希望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能就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努力，早日发动抗日战争，挽救民族危机。

黄要求我给他在南京找一个住处，他要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公开活动。我曾劝阻他，他不接受。我报告了曾养甫之后，曾要我把他带来的信全部要过来，不让他交给收信的本人；其中只有林老复覃振的一封亲笔信没有通过曾养甫，由我直接交给覃振了。因为一再劝阻黄同志不要公开活动，他仍然不听，我就遵照曾养甫的命令，把他送到中统的监牢里关了起来。

一星期之后，中共上海组织向左恭要人。黄在监牢里曾用剪子剪断通电的铁丝网希图逃走，也曾写信交我转张学良求救。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把他关了几天，他已经知道南京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了。……”曾同意释放他，并同意由我送他到上海。

曾养甫郑重地嘱咐我，蒋介石对这件事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他说，有一次，他向蒋报告同中共接触的经过，正谈话间，陈布雷进来

了，蒋立刻顾左右而言他。蒋并问过他负责联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否可靠，要特别谨慎云云。

我送黄到上海后，我们约好了一个电报密码以及电台的呼号和时间，他也把他在上海的邮箱号码告诉了我。

不久，陈济棠在广东反蒋失败，曾养甫被任为广州市长，邀我同去。我过上海时，写了一封信给黄，通知他必要时可到广州找我们。但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他。

五、吕振羽和曾养甫的商谈

吕振羽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到南京的。他到南京后，我曾邀他单独同曾养甫见面，谈过两次话。在向曾养甫介绍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北平教学多年，学生当中有不少中共党员，此番南来，对打通中共关系，沟通双方意见，定能有很大帮助。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吕振羽介绍的中共代表周小舟到南京同我第一次见面。周是湖南人，谈吐风度一切给我的印象很好，我们这次见而谈得很亲切。我首先说明我的身份，表明当时我只是因曾养甫个人的关系以中间人的身份来担任关于商谈国共联合抗日问题的联系工作的。我也把南京政府确在准备抗战的一些事实对他说了。

周小舟第一次到南京，只住了两天就走了。三月底，他第二次到南京同我见面，告诉我说，他从北平带了几封信来，要我派汽车到下关去接他的行李。他把一封由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三人具名盖章写给曾养甫和我的信交给了我^①。这封信不满

^① 这封信我曾保存了几年，一九四一年寄放在重庆乡下我的外甥女住的地方，以为可保安全，不料她的住处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燃烧弹炸中起火，这封信连同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初稿及其他文件全部被烧掉了。

五百字，可是写得十分恳切。信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大意是扼要重申了《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人发动国共两党联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运动，表示欢迎；希望能争取进一步早日实现停战议和，完成准备，发动抗日战争，求得多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华民族的解放。

周小舟还带来了另外几封信：给冯玉祥、程潜等人的信是吕同志直接找关系交的，没有经我的手；给孙科的一封信是找王昆仑交的；由林老出名给覃振的一封信，是翦伯赞介绍吕交的；给宋子文的一封信，是我陪同周小舟和吕振羽到铁道部办公室见曾养甫时由周当面交的，曾养甫当时就拆开看了。这封信比较长，我没有读，不知道内容。

这次周小舟见曾养甫的时候，还把一份《八一宣言》交给了曾养甫。曾同周谈话的态度很好，称他为“周同志”，并表示希望两党联合抗日能够早日成功。周小舟表示希望就一些有关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他问曾养甫对于共产党所提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有何意见。曾养甫说，这类的问题要向蒋介石请示。他对周小舟说，凡是一个政府都是讲求国防的，国民革命军顾名思义就是抗日的，红军既要抗日，就加入国民革命军好了。事后他对吕振羽说：“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那时周小舟还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吕对他说：“中共的党员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周以后就没有再同曾养甫见面了。

那时正是红军在山西“失利”之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和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作了几天“恳谈”。有田回到东京当了广田内阁的外相，宣称中日关系不拘泥于广田三原则，重点在共同防共。中日间形势显得有点缓和。

曾养甫要我告诉周小舟，红军在山西“失利”，对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商谈是有不好的影响的，但他认为商谈仍须继续进行。

因吕振羽一直住在南京，曾养甫曾在铁道部和他的家里约见

过吕多次,有几次谈话我曾参加。最初几次谈话,都集中在交换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和彼此的诚意的了解,以及一般性地谈论关于国共合作后行将引起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意见。

吕振羽在和曾养甫的一次谈话中,曾谈到如果国民党方面有诚意合作抗日,就应彼此避免军事上的接触,尤其是停止进攻南方红军的游击队,南京政府应停止对人民抗日言论活动的压迫,为表示合作诚意,国民政府应就这两方面有所表示。

曾养甫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共产党应停止反国民政府的宣传活动,吕所说的两件事,政府现在还不能明令照办,因为双方的合作谈判还没有成功。

吕接着表示,大意是:中共停止反政府的宣传,可以转达;打仗是双方的事情,要挨打的一方不回手是很难的;国民政府如能改变对日妥协的方针,人民对政府才能有信任,反政府的情绪自然会改变为赞成政府抗战,停止攻击的事情应由双方来考虑。

有一次曾养甫对吕振羽说,蒋介石看了《八一宣言》,很生气,说共产党不该骂南京政府卖国。曾说到这里,蒋介石的怒气显然传染到了他的身上。他像是发脾气似地说:“共产党有什么了不得,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支。……为什么定要这样攻击委员长?……历史上,力量就是是非。吕先生,你是个历史学家,难道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吗?……”

吕回答的大意是:宣传也是双方的事情,这边不也在骂共产党是“共匪”吗?报纸上天天有“朱毛匪”的字样,不也是事实吗?至于历史上的是非,后人自有定论。共产党的力量也不一定靠它的枪支的好坏和多少。我们相信曾先生一定是爱国的,否则就不会同我们坐在这里谈国共合作抗日的的事情了。

我在中间打圆场说:“‘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现在既然进行联合抗日的谈话,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谈它了。”

事后,我对曾养甫说,他这次谈话的态度过于激动,如果这样谈下去,就会愈谈愈远了。他表示仍应继续谈下去。我随即把这句

话转告了吕振羽。

在谈话中，曾养甫曾向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是不是想把我们当作克伦斯基政府？”吕的答复大意是说，克伦斯基之所以得到那样的下场，是他自己造成的；国民党政府是否会成为克伦斯基政府，这还得由国民党诸公自己去决定。

四月底，吕在曾养甫家中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四项具体条件，大意是：

（一）释放政治犯，开放抗日的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二）在现有的国民政府基础上，组织各党派各阶层的联合抗日政府，组织联合的抗日武装部队；

（三）让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并划定防区；

（四）中共可停止土地改革，但须承认现在苏区民主政府的合法地位。

曾养甫听了之后，表示这些问题太大，要请示。

吕说：“我想听听曾先生个人的意见。”

曾养甫的答复是很简单的：“停止土地改革很重要。释放政治犯我想没有问题。将来谈好以后，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等中共人士都可以作国民政府委员。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我要向委员长请示，不便表示意见。”

六、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

自从周小舟带来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三人联名盖章的信并会见了曾养甫以后，我就一再向曾养甫建议，应该给一个关于双方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的回信。吕振羽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四项条件以后，我又催促过。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的一个上午，我被一个电话邀到了曾养甫的家里，陈立夫已先在那里。我们没有谈什么闲话。曾养甫给了我几张信纸，要我坐在他的书桌旁边，他们两人站在我背后。陈立夫

用他那种我听不大清楚的湖州话对我说：“我们现在给他们写封回信。”他要我笔录下来，接着就念出了下列四项办法。他用“K”字代表国民党，“C”字代表共产党。第一项他念了几次我才听懂。

由于全部文件都被日本燃烧弹烧毁，我自然不能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但下面所写的可以相信是大致不错的：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写完了以后，陈立夫问我说：“怎么样？”“能这样办自然很好。”我很满意地回答他。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集团从一九三八年即抗战发生的第二年起，由于看见红军势力一天天地强大，就开始违背这四项目诺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同陈立夫见面谈国共联合抗日的问题，我也把联系的经过扼要地向他报告了一下，并表示希望两党合作能早日成功，抗日战争能早日发动。

我当时这样想：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心腹，他能提出这样的办法，足以表示蒋介石集团确有诚意进行联共抗日的谈判。这便巩固了我对国共联合抗日可以成功的信心。

我把这四项目诺另外抄写了几份，分别交给了吕振羽、左恭和中共长江局的那位黄同志。

在曾养甫去广东以前，吕和他的谈话都集中就双方的四项条件交换意见，没有什么进展。

六月间，吕振羽又向曾养甫重复提出了下列两个具体问题：（一）划定防区让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或指定路线北上并保证安全通过；（二）释放政治犯。

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曾养甫当面答复，表示当然可以办到，只要中共方面开名单来，就可照办。这件事后来是办了的。这

也是因为西安事变时张学良要蒋接受的条件中也有这一项的缘故。

关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红军的集中问题，曾养甫向蒋请示后，回复吕振羽说：“暂时可以不必，但可以分散北上。”

在六月间的谈话中，曾养甫表示他愿意自己去一趟延安。他说：“延安的熟朋友很多，我可以去，只要安全不成问题。”又说：“最好能邀周恩来先生来一次南京，我们可以当面解决一些问题。”

七月底陈济棠反蒋失败，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对吕说：“我现在要到广州去，不能去延安了。我们打算请张冲去一次。”

曾养甫在动身去广州之前，曾将我同长江局的黄约好的一份电报密码交给吕振羽，并说：“以后可以用电报谈。”他还指定汉口电台为和延安通报的专用电台。

我建议可否邀吕振羽一道去广州，以免中断联系。曾养甫表示同意。吕振羽即于九月间到了广州。

我又建议如果周恩来不便南来，可请邓颖超来一趟。曾养甫也同意。我除了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吕振羽之外，还在广州替邓颖超租好了一幢房子，但她并没有来。抗战发生后，她才到过一次广州。

七、西安事变发生后潘汉年同陈立夫、 曾养甫的接触

蒋介石集团由于时刻准备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所以对于通过曾养甫进行的国共联合抗日问题的商谈保持绝对秘密。这和中共中央屡次公开宣言主张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坚决态度和作法成为鲜明的对照。《八一宣言》我还是在路过上海时在李公朴家才见到的，面八月二十五日中共致国民党的信，应该说是进行商谈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的文件，是继续谈判的基础，可是连我这个负责联系的人也没有让看一看这个文件。蒋介石集团的用心在于不让人民知道中共是坚决主张抗日而他们自己则是在对日妥协的真